

教育及經濟全球化脈絡下華人教師典範 之自我形塑：認知與行為層次的分析

陳文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全球化仍是一種人類業已創造但尚未完全掌握的前景。面對全球化，華人教師若對於典範的自我形塑採取創造性的回應，較具有主動和操之在己的積極意涵。本文旨在探究全球化脈絡下華人教師進行創造性的典範自我形塑時，在認知與行為層次上的應有作為。作者首先描述全球化的主要徵象與面向，其次提出「宏觀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以為華人教師回應全球化的認知參考途徑。接着，本文提出批判和轉化兩種方法，用作華人教師適切回應經濟全球化誘因排擠效應的行動準則。藉由認知與行為的典範自我形塑，將有助於華人教師經由教育實踐來營造一個避開全球化負面衝擊的美好社會願景。

關鍵詞：全球化；教師典範；誘因排擠效應；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前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乃是一種全球性的社會變遷，其影響涉及全世界人類，華人社會自不例外。從社會變遷與教育關係的演變大勢觀察，大致可分為「傳統社會典範的教育」、「現代化社會典範的教育」與「全球化社會典範的教育」等三種典範，且後繼典範對前一典範多少會進行某種程度的修飾或重塑。本文脈絡下的「典範」，乃參酌 Thomas S. Kuhn 的學科典範概念（Kuhn, 1996），其意涵指「多數教育社群成員所共享的符號、用語、概念、方法和基本觀點等」。

傳統社會典範的教育在於培養官僚體制成員和教育人員，同時兼具心性養成、道德陶冶、社會教化等功能。工業革命後，人類開啟了現代化社會典範的教育。由於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產業結構轉以工商業為主、農業及手工業為輔，生產方式轉而重視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二次大戰結束後進入冷戰時期（1945-1990），各國競相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其主要目標就是追求「社會結構的現代取向」（如工業化、都市化等）與「國民性格的現代取向」（如理性化、消費取向、都市偏好、

地理遷徙等)。是以，現代化典範的教育主要在促進該國的社會結構轉化，以及培養國民的個人現代性。

冷戰結束後的 20 世紀 90 年代起，由於電腦及網路科技突飛猛進，資訊傳輸無遠弗屆，人際互動與資訊獲取方式產生革命性改變 (Yoo, 2014, p. 949)，遠距互動溝通頻繁，國家角色遞變，國界在某些領域已日漸模糊 (Garcia, 2013, p. 904)，世界逐漸成為地球村 (global village)，人類邁向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社會典範的教育於是成型。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市場資本主義 (market capitalism) 更盛於前，知識經濟 (knowledge economy) 躍居主流。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深度與廣度空前，其前景又難以預料 (Law, 2008, p. 1279; Ku & Yoo, 2013, p. 210)，在人類尚未找到馴服全球化之道前，華人教師在此脈絡下要如何適切因應呢？

大體上，華人教師在面對全球化浪潮時，有兩種可能回應模式：一是順應式回應 (adaptive response)，一是創造性回應 (creative response)。順應式回應是消極被動地接受全球化衝擊對教師典範所進行的自然重塑；創造性回應則是積極主動地將全球化衝擊導引成教師典範自我形塑的動能。而要主動積極轉化此一自我形塑動能，多數教師首先要在認知層次上對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有宏觀的理解，並建立一套引導行動的理念參照架構。其次，多數教師在行為層次上對於全球化的主要衝擊，要能以批判轉化的具體作為回應。是以，在人類尚未充分掌握全球化前景之際，在地的教育體制和工作者，對於全球化宜採創造性回應模式，方能避免喪失在地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本文的旨趣即在探究華人社會文化仍重視師道之際，教師若採取創造性回應模式面對全球化以進行典範自我形塑時，在認知和行為層次之「能知」和「應行」的內涵為何。本文除前言外，將先描繪全球化的主要徵象和主要面向，以作教師理解全球化的背景知識，其次分別就華人教師認知層次的「如何看待全球化下的教育」與行為層次的「如何回應全球化主要衝擊」等兩個面向，分別闡述華人教師的典範自我形塑要義。最後，本文將提出綜合性結語。

全球化主要徵象、主要面向與傳統華人教師典範遞移

全球化用詞在公共事務領域的運用已相當廣泛 (Ku & Yoo, 2012, p. 20; 2013, p. 211; 亦見陳文政, 2013, 頁 8)。不過，由於全球化概念高度複雜，尚未有統一的學術定義。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指全球相互依存關係的廣化、深化和快速化 (Held, McGrew, Goldblatt, & Perraton, 2003, p. 67)，Giddens (2003) 則視現代性的全球擴張為全球化 (p. 60)。綜合而言，全球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遷 (Kumar, 2009, p. 33)，它藉由人流 (human flows)、物流 (goods flows)、資訊流 (information flows)、資本流 (capital flows)、理念流 (ideological flows) 等流動機制 (Garcia, 2013, p. 906)，

使人類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Ku & Yoo, 2012, p. 21; 2013, p. 212）、生態、法律、人權等領域發生跨國整合而導致全球關聯日益緊密的過程。

全球化的主要徵象

全球化是高度複雜的超巨型社會變遷，其完整徵象雖然難以盡述，但研究者為了簡要掌握全球化，對其主要徵象曾做了若干歸納。例如，Held & McGrew（2003）將全球化歸納為遠距行動、時空壓縮、互賴加深、世界縮小、全球整合、區域權力關係重構、全球意識、區域連帶關係強化等八個主要徵象（p. 3）。本文認為這八項有若干重疊之處，故將其簡化為以下四個主要徵象：

1. 遠距互動（interaction at a distance）——在資訊網路及通訊科技日益創新、功能不斷提升的基礎上，全球行動者之間可以不用親臨現場而以超越面對面（face to face）的方式互動與溝通。是以，遠距互動是全球化的人際徵象。
2. 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遠距互動與溝通使人類行為不但跨越了西伐利亞體制（Westphalia regime）（陳文政，2013，頁 8；Ginsburg, 2010, pp. 29-30）的國家主權界線，亦超越了國界藩籬的地理障礙，從而使人類活動範圍大幅延伸，直接縮短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世界亦隨之縮小。就此，時空壓縮是全球化的環境徵象。
3. 全球互賴（global interdependence）——隨着世界縮小，國界逐漸泯除，由區域連帶到全球一體的遞移日漸明顯，全球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法律、人權等領域的互賴日益加深，伴隨而來的是全球整合之需求。於是，全球互賴成為全球化的結構徵象。
4. 全球意識（global consciousness）——伴隨着全球互賴日益強化，以全球關聯（global interconnectivity）為基礎、以全球永續性（global sustainability）為核心理念的全球意識逐漸抬頭。從精神層次看，全球意識是全球化的心理徵象。

全球化的主要面向

多數人都承認全球化具有多元面向特性，且不同面向並存又相互影響，這些面向主要包括經濟、金融、市場、科技、資訊、傳播，乃至於政治、制度、規範、文化和理念等。Giddens（2003）為了化繁為簡，從社會學觀點將其簡化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world capitalist system）、民族國家體系（nation-state system）、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及世界軍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等四個面向（pp. 62-66）。本文認為此一分類過於簡化，對於宏觀掌握全球化而言，稍有不足。本文從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觀點將全球化歸納為七大面向：

1. 經濟面向——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最顯著的面向。隨着市場資本主義盛行，全球經濟在生產、消費、貿易、金融、勞力分工等方面的互賴日深，經濟全球化亦使全球經濟治理（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由國家中心參與體系轉為多重角色參與體制（Jackson, 2013, p. 40）。
2. 政治面向——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因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權力配置，使傳統國際政治逐漸轉型為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已非由主權國家所主導，許多國際法庭（如歐洲法院）、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等所作成的判決或決策，皆未經主權國家同意仍具有拘束力（de Búrca, Keohane, & Sabel, 2013, p. 724）。然因目前尚無整全的全球政府，全球政治仍處於全球多元主義（global pluralism）的治理狀態。
3. 社會面向——全球化在社會面向的主要特徵是全球社群的出現。全球社群包含兩個層次：在團體組織層次上，由於全球性商業組織、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全球性民間組織、全球性公民團體等交織互動趨於熱絡（Jackson, 2013, p. 39），強化了全球組織性的社會網絡；在個人層次方面，隨着全球意識擴張，由參與遠距互動的全球公民逐漸形成全球性公民社會網絡。
4. 生態面向——全球維生系統的互賴加深與一體化，加速了生態全球化。全球性生態問題（如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傳染疾病、核能輻射等）的妥適有效防治、管制與解決，已非單一國家所能勝任，必須仰賴有效的全球合作機制才可克服。大體上，全球化的生態面向所關切的核心議題，最終歸結於全球永續性（global sustainability）的追求。
5. 文教面向——經濟全球化與全球社群的形成過程中，直接或間接促成了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由民間公司或企業所主導（Held & McGrew, 2003, pp. 17-18）。隨着網路科技及大眾傳播媒體發達，全球社群接觸全球性大眾文化的機會大增，文化交疊情形普遍。同時，隨着人力的全球流動，各國在教育理念、教育體制、課程教學等方面相互參照觀摩，教育全球化現象亦日漸彰顯。
6. 法律面向——經濟全球化、全球政治、生態全球化等趨勢，迫切需要一套有效的全球性規範，法律的全球化乃因勢而起。由國際法歧異性（fragmentation）所催生的全球法律秩序與全球憲法秩序逐漸浮現。目前全球治理體系基於現實需要，已先在部門法律秩序（如全球經貿秩序）中形成共識而完成相關規範（如世界貿易組織憲章）。未來，追求更高層次的全球憲法規範將成為全球法學社群研究的重點。例如，學者呼籲國際社群應採行更普遍的標準來極大化全球貿易（Bacchus, 2014, p. 1）；Lee（2010）甚至呼籲創設世界政府以有效克服當前全球性的集體行動難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pp. 329, 330, 346, 357）。

7. 人權面向——人權保障的全球化亦是全球化的重要面向。此一面向有兩個主要特徵，即「人性尊嚴的全球憲制化」與「基本人權的全球憲制化」。前者表現在實務上是「全球內國憲法採納人性尊嚴的普及化」、「國際規範採納人性尊嚴理念的普遍化」及「司法釋憲併入人性尊嚴價值的全球化」（陳文政，2013，頁 49）；後者則表現在「內國憲法對人權的普遍保障」與「國際人權法的普遍保障」（陳文政，2013，頁 53）兩方面。自 2005 年起，強調各國應有保障人權義務的「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理念（Havercroft, 2012, p. 137; Davis, 2011, p. 897）更已躍上國際法律舞台（Rose, 2014, p. 209），成為人權全球化的重要議題。

以上基於分析需要將全球化分為七大面向，但各面向之間並非完全獨立，實際上彼此之間相互交錯、聯屬、影響和牽引，因而具有互為鑲嵌性（inter-embeddedness）的關係。

華人教師典範遞移

華人教師典範在文化的浸潤中逐漸形成和演化，而有一定的基本內涵。同時，它亦在歷史洪流與社會變遷中因應時空條件的轉變而遞移。

傳統華人教師典範的內涵

傳統華人文化深受儒家思想浸潤，華人社會對教師典範的認定亦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大體上，由華人社會在長期歷史過程所塑造的教師典範，其主要內涵包括「教師社會地位」及「教師角色組合」兩項。

首先，傳統華人社會將「教師社會地位」與天、地、君、親並列。由於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是「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佔有的位置」（Light & Keller, 1985, p. 89），故華人傳統視教師與天、地、君、親等在社會中擁有相同地位。在此結構下，華人教師與學生之間是處於「師尊一生卑」的垂直權力關係。

其次，就「教師角色組合」而言，社會對某一地位所期待的行為、權利與義務即為角色（role），而附屬於每一個地位的種種角色稱為角色組合（role set）（Light & Keller, 1985, p. 89）。傳統華人社會認定教師的應有義務，大多認同韓愈在〈師說〉一文的典範性見解，即傳道、授業、解惑；對教師權利的認定，主要包括對學生學習的評量權和對學生行為的輔導勸誡權，並默許教師若干懲戒權；對教師行為的期待則是言教與身教兼顧，亦即經師與人師並重。

傳統華人教師典範的遞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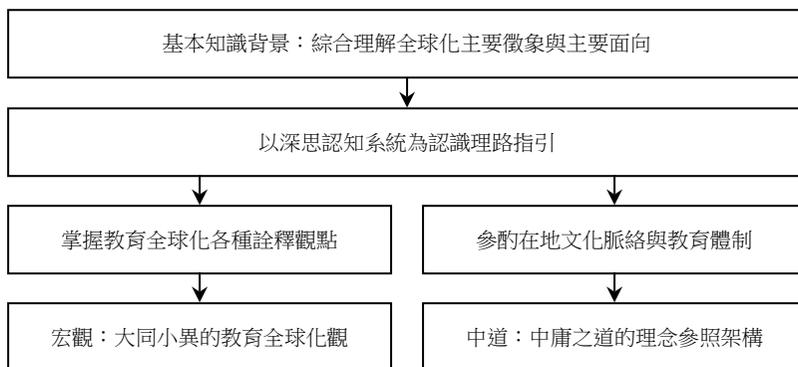
上述傳統華人教師典範行之有年，具有相當垂範作用。惟現代化潮流盛行後，這典範為回應社會變遷而有所重塑，進而發生遞移。例如，基於平權思想，教師地位從天、地、君、親、師五位並列中分離，教師從神壇上走下來，與學生的垂直關係逐漸轉為水平關係。其次，所傳之道、所授之業與所解之惑，都必須因應現代化教育所需而進行調整或再造。唯一不變者是對教師行為仍維持「言教與身教兼顧」的高度期待。

自 20 世紀末迄今的全球化脈動，誠如前述，由於內涵至為複雜，面向至為多元，衝擊至為廣袤，華人教育工作者若採順應式回應模式，則華人現有教師典範將會被動接受全球化的重塑，其結果實難以預料。相對的，若採創造性回應模式，則華人教師將會進行典範的自我形塑，具有主動性和操之在己的積極意涵。

認知層次的典範自我形塑：宏觀中道認識教育全球化

華人教師藉由回應全球化所進行的典範自我形塑，在認知層次上的核心議題涉及「如何看待全球化下的教育」，而「如何看待全球化下的教育」又以「如何理解教育全球化現象」為基礎。就此，華人教師首先對前述全球化主要徵象與主要面向應有綜合性理解，因它是基本知識背景。其次，以人類深思認知系統（*deliberative cognitive system*）為認識理路指引，一方面掌握教育全球化各種詮釋觀點的優劣，並形塑宏觀的詮釋觀點，另一方面則將既有理解參酌在地文化脈絡與教育體制性質，歸納出一個中道而又符合在地社會情狀的理念參照架構（*ide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共同作教師典範自我形塑的認識理路。其示意圖如圖一。

圖一：宏觀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



以深思認知系統為認識理路指引

人類的認知有其複雜性，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 的最近研究顯示，人類的思維有兩套而非一套認知系統 (Sunstein, 2013, p. 1838)：其一是直覺系統，另一則是深思系統 (見表一)。採用直覺認知系統者，其運作的主要特徵包括衝動直覺、簡單快速、自動省力、短視近利等；相對的，採用深思認知系統者，其運作主要特徵則為沉穩深思、繁複緩慢、調控費力、深謀遠慮等 (Sunstein, 2013, pp. 1838–1840)。

表一：人類認知系統與作用

人類認知系統	系統 1：直覺系統	系統 2：深思系統
系統運作特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衝動直覺 • 簡單快速 • 自動省力 • 短視近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沉穩深思 • 繁複緩慢 • 調控費力 • 深謀遠慮
大腦作用區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腦杏仁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腦葉前皮質
認知運作結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誤判率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誤判率低

資料來源：整理自 Sunstein (2013, pp. 1838–1840)。

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的研究顯示，兩系統在大腦中的運作各有生理上的對應區域 (Sunstein, 2013, p. 1839)。深思系統的反應區是大腦葉前皮質 (prefrontal cortex)，該區是人類大腦最進化區域，主掌慎思運作；相對的，直覺系統的反應區則是大腦杏仁體 (amygdala)，它與許多自動運作機制有關。大腦兩個區域之間會交互作用，兩系統的設計和運作是依據所要解釋 (解決) 問題是否費力或不費力而定。例如，人面對簡單問題時習慣用直覺系統，面對困難問題則傾向採用深思系統 (Sunstein, 2013, p. 1840)。就結果而言，採用直覺系統者失誤率較高，採用深思系統者失誤率則較低。例如，若某人必須使用外語解釋 (解決) 問題時，即會採用深思系統，其結果會使某些重大失誤得以避免 (Sunstein, 2013, p. 1840)。實務上，Sunstein (2013) 曾歸納出四種行為市場失靈 (behavioral market failure) 的類型：(1) 當下偏差與時間判斷不一致，(2) 忽視隱藏但重要的徵象，(3) 不符現實的樂觀，及 (4) 或然率處理不當 (pp. 1840–1852)；而這些失靈行為皆因運用了直覺認知系統所致。

依據上述科學研究結果，由於全球化及教育全球化在本質上具有高度複雜性，華人教師應承認並嚴肅看待這些複雜性，從而在面對類此議題時能以深思認知系統為整體認識理路的指引。雖然採用深思認知系統較為繁複緩慢和費力，但卻較為沉穩和深謀遠慮，亦可降低失誤率。

宏觀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

教育全球化的主要詮釋觀點

有關「如何理解教育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學術研究迄今尚無一致見解。Spring (2008) 根據不同研究歸納出四種詮釋觀點，即世界文化論 (world culture)、世界體系論 (world systems)、後殖民主義論 (postcolonialist) 及文化主義論 (culturist) (pp. 334–337)。本文基於後殖民主義論與世界體系論的主要論旨相近，並斟酌各種論述實質內涵與名稱的相稱性之後，將 Spring 的歸納再簡化為三種詮釋觀點。

首先是文化聚合論 (cultural-convergence thesis)，其基本論點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終將逐漸整合為單一的全球文化 (a single global culture) (Spring, 2008, p. 334)，且當前蘊含西方大眾學校教育理想的世界性文化 (world culture) 業已存在，世界各國菁英多會選擇當前最佳學校教育模式。於是，世界趨勢將由教育聚合邁向全球文化聚合。換言之，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藉由教育全球化過程，終將逐漸整合為單一的全球文化。教育全球化是形塑單一全球文化的過程或手段。

其次是文化差異論 (cultural-variation thesis)，它是文化聚合論的相對論述，強調文化差異及在全球脈絡中相互採借教育理想的重要性 (Spring, 2008, p. 334)，並認為各國菁英仍會依據不同國情而在全球多元教育理想的模式中擷取所需；由於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知識體系，且認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異 (Spring, 2008, p. 336)，因此教育理想亦各有不同。簡言之，文化差異論認為教育全球化的旨趣不在促進單一全球文化或教育制度的全球聚合，而是在全球脈絡中相互採借教育理想的過程或手段。

第三是世界體系論 (world-system thesis)，它視全球為一個整合但分為兩個不平等區域的體系：其一是位居核心區域的富裕國家 (以美國、歐洲聯盟各國及日本為主)，另一則是處於邊陲 (peripheral) 區域的貧窮國家。核心國家擁有宰制邊陲國家的權力，並藉由種種教育支持，灌輸資本主義思想模式與各種價值給邊陲國家，使其既有權力取得正當化基礎 (Spring, 2008, pp. 334, 335)。因此，教育全球化是核心富國為正當化其權力以支配邊陲窮國所採取的手段或過程。至於相似的后殖民主義論述則認為，教育全球化是富國促進其利益的教育投資，亦是富國文化帝國主義盛行的結果。

教育全球化詮釋觀點的分析

一、文化聚合論的綜合分析

誠如前述，文化聚合論將教育全球化視為形塑單一全球文化的過程或手段，但所預設的單一全球文化，卻是以蘊含西方大眾學校教育理想的「世界性文化」，所持理由是現有的西方學校教育是最好的。

文化聚合論的上述論點固有所本，但此一詮釋途徑仍有諸多盲點。首先，從事實可能性來反思，文化聚合論認為教育全球化必將世界上所有文化聚合成單一的文化，實為過早之論。蓋教育全球化固有其動能，但此動能並非絕對強大而全無匹敵之力，不同文化為捍衛其主體性，必會尋求若干抗衡之道。

其次，從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檢視，文化聚合論預設「單一全球文化」是人類終極文化形式，此一預設亦屬過度臆測之論。蓋當前世界上各種文化因異質性而呈現的多樣性，乃經年演化而成，此一異質性反映了世界人類在生活體現諸面向的差異，教育全球化固然可能將世界各種文化進行某種程度的整合，但不可能全面消除文化的異質性。

第三，文化聚合論認為現存蘊含西方大眾學校教育理想的「世界性文化」為最佳文化模式，此乃文化優越感之論。誠然，當前西方學校教育模式固適用於市場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否為最佳，並非普世所認同。西方學校教育模式為迎合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強調人力資源教育的重要性，固無可厚非，然教育並非僅為市場服務。當前教育逐漸市場化並受市場資本主義邏輯所支配的窘狀，正是西方學校教育模式的盲點，理應加以批判修正而非奉為圭臬。

二、文化差異論的綜合分析

文化差異論是文化聚合論的相對論述，在承認多重知識、學校教育隨文化差異而有不同選擇，以及地方與全球應學習互動（*Spring, 2008, p. 337*）等理念之下，認為教育的全球化不在促進單一全球文化或促成教育制度的全球聚合，而是在全球脈絡中相互採借教育理想的過程或手段。

綜合而言，由於文化差異論是文化聚合論的相對論述，因此亦能避開前述文化聚合論的種種盲點。然而，文化差異論卻忽略了教育全球化可能帶來某種全球聚合的可能性與價值。例如，在經濟全球化與生態全球化的衝擊下，與全球生存有關的生態環境保護領域裏，可能出現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全球性生態環境保護理念；另如，在全球政治形成後，在解決各種治理議題的急迫需求下，某種共同認可並遵守的全球性規範亦可能逐漸出現。

三、世界體系論的綜合分析

世界體系論與後殖民主義論在教育全球化的基本觀點上類似，都先將世界一分为二，即「富國—窮國」、「核心—邊陲」或「核心富國—邊陲窮國」，然後視教育全球化為核心富國正當化其支配權力（世界體系論），或視為富國促進其利益的教育投資，且為富國文化帝國主義盛行的結果（後殖民主義論）。

世界體系論突顯出教育全球化在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全球不平等關係中所扮演的工具角色；換言之，教育全球化使窮國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弱勢地位更為牢固，強調的是教育全球化的宰制性格。後殖民主義論將教育全球化視為富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產物，所聚焦者是教育全球化的殖民性格。總的來說，世界體系論（與後殖民主義論）皆在指摘教育全球化已成為全球不正義（global injustice）的幫兇，是富國剝削窮國的工具。

然而，世界體系論（與後殖民主義論）將世界近 200 個國家或地區簡單二分為「核心—邊陲」或「核心富國—邊陲窮國」，其適切性不無商榷餘地。蓋世界各國發展程度殊異，皆非前述簡單二分法所能概括。同時，世界體系論（與後殖民主義論）並未從全球化的全球互賴基本徵象出發，強調核心富國與邊陲窮國的唇亡齒寒關係，進而提出核心富國對邊陲窮國應有的合理對待作為。總之，世界體系論對教育全球化的詮釋，道德論述有餘，事實說服力不足。

宏觀的教育全球化詮釋觀點

從宏觀的視角檢視教育全球化各種詮釋觀點，本文認為「大同小異」（unity with diversity）是較為適切務實的教育全球化觀。「大同小異」概念與新儒家學者劉述先所主張的「理一分殊」（coherence is one;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劉述先，2010，頁 135–138，163–166；亦見 Angle, 2012, p. 177）相通。

所謂「大同」，其旨趣與「理一」相通。具體而言即「普遍性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是指在全球化脈絡下，凡與全球人類（humankind-based）（Kotzur, 2012, p. 591）生存發展所需的休戚相關議題，如全球環境永續、全球衛生與安全、本於人性尊嚴的全球基本人權等（Chen, 2013, pp. 27–28），應該成為世界各國學校教育體制及工作者所共信和認同的理念。這些理念的傳遞與落實正是教育全球化的主要標的。此一觀點承認全球的共通性，與前述文化差異論有明顯不同。所謂「小異」，其精神與「分殊」相通。具體而言即「差異性原則」（principle of difference），是指凡事務無關全球人類生存發展所不可或缺的議題，應保留其在地差異性（local difference），以維持全球文化的多樣性。此點則與文化聚合論堅信單一全球文化的觀點明顯有別。

綜合而言，教育全球化應該一方面就全球「理一」的「大同」議題發揮積極功能，另一方面則對在地「分殊」的「小異」事務保持尊重和不干預態度。常態上，「大同」與「小異」不必然存在衝突，倘「大同」與「小異」遇有扞格，在地的教育體制宜基於維護文化意識，以求同存異態度積極尋求調和之道。蓋文化意識乃民族靈魂之所繫，亦是維持「小異」的關鍵，在全球化脈絡下仍必須獲得基本維護。換言之，教育全球化就是維持大同小異全球文化樣貌的手段或過程。由於「大同小異」觀點能兼顧普遍性與差異性，既無文化聚合論的優越爭議，亦無「核心富國」與「邊陲窮國」簡單二分的褊狹缺憾，具有宏觀和理性的相對優點。

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

面對全球化衝擊，華人教師在認知層次上除要建立宏觀的「大同小異」教育全球化觀點之外，還要進一步歸納出一個符合在地社會情狀的中庸之道的理念參照架構，以作教師典範自我形塑的認識理路。

所謂中庸之道的理念參照架構是指：教育工作者在綜理解全球主要徵象與主要面向的背景下，將此一理解鑲嵌（embed）到自己的教育體制與文化脈絡中，建構出一套維持全球化與在地化（localization）動態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發展的理念圖像，用作導引教師典範運作的重要參照架構（參閱圖一）。由於「維持全球化與在地化動態平衡」是此一理念參照架構的核心和關鍵，而各國因文化和國情不同，維持此一平衡所需的機制亦各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文化背景相同，但因政治、經濟、教育體制有異，或國家總體發展程度不同，亦會影響此一參照架構的內涵。舉例來說，由於民主確有其價值，全球民主化已蔚為風潮。但最新研究顯示（Diamond, 2015），全球民主化並非只進不退。因此，基於民主並無四海皆準的內涵，各國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仍有揉合在地國情與文化的餘地，並藉此保持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平衡。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Tushnet（2015）的近期研究即以「威權式憲政主義」（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來描述新加坡的憲政民主發展。Tushnet 認為，新加坡政府基於該國族群和宗教的複雜性和歷史經驗，為維護族群和宗教和諧而採取一種結合「相當自由公平的各項選舉」與「中度壓制性控制表意自由與個人自由」的政府制度（pp. 391, 414）。Tushnet 雖為美國人，並不以美國式民主為標準來批判新加坡，反而為新加坡的「威權式憲政主義」進行柔性辯護，頗有間接肯定該國能調和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意味。以此觀之，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台灣等，雖皆屬華人文化地區，但因政治體制各異，教育體制及經濟發展程度亦有別，即使面臨全球化的情景大致相同，但教師所需的理念參照架構仍各有異。

簡言之，華人教師在全球化脈絡下如欲進行典範自我形塑，在認知層次上除對全球化的脈絡要有綜理解之外，對教育全球化更要有宏觀的認識。對此，本文認為「宏觀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是合宜適切的途徑，而「大同小異的教育全球化觀」及「中庸之道的理念參照架構」則為此認識理路的兩大基本內涵。

行為層次的典範自我形塑：批判轉化經濟全球化效應

華人教師除在前述認知層次上要掌握「宏觀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之外，在行為層次上還要對「如何回應全球化主要衝擊」有具體妥切的作為，方能在知行合一相輔相成之下，完成典範自我形塑的目標。所謂「全球化主要衝擊」，一般即指經濟全球化對人類所帶來的衝擊，而經濟全球化在市場資本主義邏輯支配下，對人類

行為的主要影響機制就是誘因理論（incentive theory）中的排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本文暫稱為誘因排擠效應。依此推論，「如何回應全球化主要衝擊」的核心，實為如何回應誘因排擠效應。

全球市場經濟中的誘因排擠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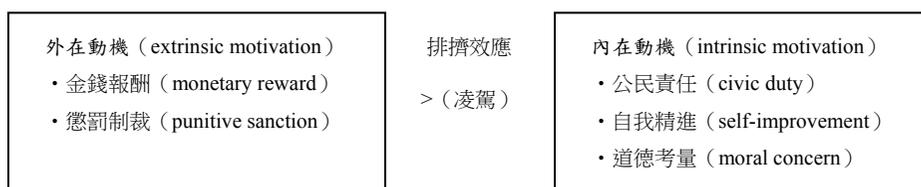
市場經濟與誘因密切相關，論者甚至認為誘因是當代生活的基石，亦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Sandel, 2012, p. 85），而蘊含於誘因理論的排擠效應，對於人類行為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華人教師對此效應宜有了解，才能在行為上作出適當回應。

誘因排擠效應的意涵

社會科學家在研究誘因理論時，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動機可分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兩類（Atiq, 2014, pp. 1072, 1080; Feldman, 2011, p. 12; Frey & Oberholzer-Gee, 1997, p. 746; Sandel, 2012, p. 122）。內在動機源自行為者內部的價值決定，如品味興趣、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責任感、成就感、道德信念及倫理考量等；外在動機則源自行為者外部的利害考量，例如金錢報酬（monetary reward）、懲罰制裁（punitive sanction）等。

在區分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餘，社會科學家對於誘因排擠效應的界定尚有若干差異。Sandel（2012）認為誘因排擠效應的發生，是「當人們參與一項從內在認定有價值的活動時，提供金錢報酬反而因貶抑或排擠其內在興趣或應許而弱化了他們的動機」（p. 122）。Atiq（2014）則指出，當內在動機（如公民責任、自我精進、道德考量）因外在動機（如金錢報酬或懲罰制裁）的存在而產生減損，因而出現外在動機排擠內在動機的現象，一般稱為排擠效應（pp. 1072, 1080）（見圖二）。因此，當人決定從事某一行動時，其誘因系統中的內在動機（內部價值決定）受到外在動機（外部利害考量）的排除或擠壓時，稱為誘因排擠效應。

圖二：人類行為的誘因排擠效應



資料來源：整理自 Atiq（2014, pp. 1072–1073）。

誘因排擠效應的運作

雖然外在動機不必然對內在動機造成排擠效應，但總體上，排擠效應確實是明顯可見的重要現象（Atiq, 2014, pp. 1072, 1080）。究竟市場經濟中誘因排擠效應是如何運作而影響人類行為的呢？基本上，誘因排擠效應的運作與市場資本主義的邏輯有密切關係。市場資本主義是一種主張以理性自利為動機、以自由市場為基礎、以公平競爭為原則、以本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為方法、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經濟制度，而一套維護公平競爭的明確有效法律則是這制度正常運作的必要保證。市場經濟假定個人是理性自利的行動者，市場所提供的各種利潤與法律制裁成為行動者的誘因（即外在動機），而行動者在自由公平的市場中相互競爭，並運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來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

然而，社會科學家雖然大致承認上述邏輯，但亦認為個別行動者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的行為，除利潤追求與法律制裁等外在動機外，仍受其內在動機影響，而誘因排擠效應就發生在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的互動關係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內在動機人皆有之，只是強弱有別而已。同理，外在動機亦有強弱之分。內在動機的強弱（顯著或不顯著）與外在動機的強弱在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結果自然有異。另外，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者間並非存在單一或單向關係，實質上相當複雜。由於現有文獻多聚焦於外在動機如何（how）與何時（when）侵蝕內在動機（Feldman, 2011, p. 23），本文基於篇幅，暫時從眾並依據外在動機強弱與內在動機強弱的互動關係，藉此說明不同排擠效應的運作機制（見表二）。

一、順向排擠效應

如表二所列，本類型包括「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及「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兩種情境下所發生的排擠效應。

表二：市場經濟下誘因排擠效應的運作與類型

誘因系統		誘因排擠效應的運作機制		
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互動	行動者對外在動機的反應	誘因排擠效應類型
不顯著 （理性自利動機較強；行為表現較具價格取向）	顯著	內在動機遭到完全排除	高度配合順從	順向排擠效應
顯著 （理性自利動機較弱；行為表現較具價值取向）	不顯著	內在動機遭到部分排除	傾向配合順從或策略性回應	
顯著 （理性自利動機較弱；行為表現較具價值取向）	顯著	內在動機遭到輕度擠壓	傾向抵制抗拒	逆向排擠效應
不顯著 （理性自利動機較強；行為表現較具價格取向）	不顯著	內在動機遭到高度擠壓	強烈抵制抗拒	

首先，就「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的情境分析。所謂「內在動機不顯著」是指行動者的主觀內部價值決定較弱（即個人品味興趣、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理念相對薄弱），而理性自利動機較強，行為表現較具價格取向（price-orientation）的抉擇情境。所謂「外在動機顯著」，是指市場所提供的財物報酬極為誘人或懲罰制裁相當嚴厲的情境。當這兩種情境相遇，由於情境容易判斷，行動者易以直覺認知系統回應，並對外在動機表現出高度順從態度，從而使外在動機取得壓倒性勝利，內在動機遭到完全排除。這類型的案例甚多，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勇夫們就是典型案例。

其次，就「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的情境分析。所謂「外在動機不顯著」，是指市場所提供的財物報酬並不誘人或懲罰制裁亦不嚴厲的情境。當「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兩種情境相遇時，行動者的理性自利動機慣性，仍會選擇順從外在動機（即傾向趨利避罰）。然而，由於財物報酬不高或懲罰制裁不嚴，行動者亦可能因另有自利考量，會以策略性方式回應外在動機。例如，有關以色列託兒所家長接送小孩行為的研究顯示（Atiq, 2014, p. 1082, Gneezy & Rustichini, 2000a, p. 8），託兒所試圖以罰款來減少家長遲到接回小孩的情形，結果罰款實施後遲到的家長不減反增，及後取消罰款，遲到的家長並未減少。研究者推測（Atiq, 2014, p. 1082; Gneezy & Rustichini, 2000a, p. 14; Sandel, 2012, pp. 64–65），家長視罰款（fine）為老師提供延長服務的代價（price），因此降低了對老師造成困擾的愧疚感。這一推測固有可能，但本文認為此乃家長們「內在動機不顯著」與託兒所提供的「外在動機不顯著」兩者相遇的可能結果。亦即，原來遲到的家長內在動機本即不顯著（責任感不強），而託兒所的罰款又不多（Gneezy & Rustichini, 2000a, pp. 4–5），因此寧可選擇接受罰款；對原先不遲到、實施罰錢後反而遲到的家長而言，當他們發覺責任感竟然可以用小額金錢來換取，足見此責任感的價值並不高，故自覺放棄亦不足惜。換言之，這情境下的責任感（內在動機）被小額罰款（外在動機）所排除了。

綜合而言，第一種情境（即「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的結果導致內在動機遭到完全排除（或壓制、掏空），第二種情境（即「內在動機不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的結果則導致本來即不顯著的內在動機遭到部分排除而變得更不顯著，兩個情境的外在動機多以順向作用（即行動者對外在動機表現出高度順從或傾向順從態度）排擠了行動者的內在動機，本文暫且稱它為順向排擠效應。

二、逆向排擠效應

如表二所列，這類型包括「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以及「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兩種情境下所發生的排擠效應。

首先分析「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的情境。所謂「內在動機顯著」是指行動者的主觀內部價值決定較強（即個人品味興趣、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理念相對強烈），而理性自利動機較弱，行為表現較具價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的抉擇情境。當這兩種情境相遇，雖然財物報酬極為誘人或懲罰制裁相當嚴厲，但在行動者理性自利動機較弱的慣性下，對外在動機易以抵制抗拒態度予以回應。

例如，經濟學家針對瑞士核廢料處置場預定地的民眾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Atiq, 2014, p. 1082; Frey & Oberholzer-Gee, 1997, pp. 749–750; Sandel, 2012, pp. 114–115, 122, 219），在毫無金錢補償之下，有 50.8% 受訪民眾願意接受，但若問附加金錢補償每人每年 2,175 美元後的意願，支持率不升反降到 24.3%，當金錢補償提高到每人每年 4,350 美元時，支持率是 24.8%，再提高到每人每年 6,525 美元時（該地區每月家庭所得 4,565 美元），支持率仍僅為 24.7%。此案例似可解讀成瑞士該地區多數民眾的「內在動機顯著」（公民責任感或公共精神），因此當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時，民眾感覺其內部價值決定受到輕微貶抑（公共精神受到賄賂），因而出現內在動機遭遇賄賂效應（bribe effect）（Frey, Oberholzer-Gee, & Eichenberger, 1996, pp. 1298–1299）所輕度排擠的情形。

其次分析「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的情境。當「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時，由於情勢相當容易判斷，行動者對外在動機易採強烈抗拒態度。此時，行動者感受到自己的內部主觀價值決定受到嚴重貶抑（即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有價值的事，別人卻用微薄的財物報酬或輕微的懲罰制裁就想收買或改變），而出現內在動機因受羞辱而遭到高度擠壓的情形。實證研究顯示（Gneezy & Rustichini, 2000b, pp. 800–801），對參與自願募款或捐血者提供小額金錢報酬反而會降低行為表現，即大致可說明這一情境。前述瑞士核廢料處置場預定地居民被問及附加金錢補償後的意願，支持度從 50.8% 降到平均 24.6% 的情形，亦是如此。

在上述兩種情境中，前一情境（即「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顯著」相遇）的結果導致內在動機遭到輕度擠壓，後一情境（即「內在動機顯著」與「外在動機不顯著」相遇）的結果則導致內在動機遭到高度擠壓，但外在動機是以逆向的反效果方式排擠了行動者的內在動機，本文暫且稱它為逆向排擠效應。

綜合以上分析，外在動機對內在動機所產生的排擠效應，與行動者的內在動機顯著或不顯著有關。倘若行動者的內在動機不顯著，則無論外在動機顯著或不顯著，行動者通常對外在動機表現出順從或高度順從，此時行動者的內在動機遭到完全排除或部分排除。相對的，倘若行動者的內在動機顯著，則無論外在動機顯著或不顯著，行動者通常會表現出抗拒或強烈抗拒。換言之，在此情境下，外在動機通常易出現反效果。此時，行動者的內在動機因自覺受到貶抑而出現被擠壓的現象。總體上，在

全球市場經濟中，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互動處於外強（外在動機優勢）內弱（內在動機弱勢）的不平衡狀態。

批判性轉化誘因排擠效應的體現

理解了上述之後，華人教師應以何種具體作為來回應全球市場經濟的誘因排擠效應，從而藉此達成教師典範的自我形塑？本文認為，由於華人社會對教師典範仍存有言教身教兼顧的相當期待，故教師可藉由批判與轉化兩個具體行動來達成：首先在批判行動上，以言教揭露誘因排擠效應的限制，以及市場資本主義邏輯的盲點；其次，在轉化行動上，應以身教彰顯內在動機的公共價值，引領學生強化其內在動機，進而改善全球市場經濟脈絡下社會成員在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間處於失衡的現狀。

言教批判誘因排擠效應的限制

言教是教師影響學生的重要生活行動。華人教師要對誘因排擠效應進行創造性回應，就必須先對其背後的市場資本主義邏輯所隱含的種種限制與盲點，進行有效的批判與揭露，其次再就誘因排擠效應的衝擊進行反思批判。

一、批判揭露市場經濟的限制

市場經濟雖是當代人類生活極其重要的構成面向，但仍有諸多盲點。首先，人類行為並非全由市場經濟所提供的外在動機所支配，人的內部價值決定（內在動機）仍有一席之地，只是相較而言，市場經濟中的外在動機較為強勢而已。

其次，就人類的真實世界而言，市場經濟背後的資本主義邏輯亦有許多盲點。前曾述及，市場資本主義是一種主張以理性自利為動機、以自由市場為基礎、以公平競爭為原則、以本益分析為方法、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經濟制度。這一邏輯的盲點包括：第一，人類面對抉擇的情境多樣又複雜，對交易環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有限，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及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的情況下（*Bubb & Pildes, 2014, pp. 1603, 1613, 1669–1670*），有些決定固出於理性，有些則不全然出於理性。第二，許多在自由意志下所作的利他決定（如捨己救人），亦證明了人類所作決定並非全屬自利行為。以上兩點可歸納為理性自利動機的盲點。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公共政策層次雖然有提升效率、降低認知偏差及有效排定優先順序等優點（*Ahdiéh, 2013, pp. 2010–2016*），但卻簡化了個人偏好（*Atiq, 2014, p. 1077*），亦難將某些價值予以量化（*Sunstein, 2014, p. 171*），使行動者的決定難有精確判準。例如，美國行政命令 13563 號承認生活中某些價值實在難以量化或無法量化（如人性尊嚴），因此授權相關機關在合法情況下考量該等價值（*Bayefsky, 2014, p. 1735; Sunstein, 2014,*

p. 171)。換言之，成本效益分析並非無往不利的萬應靈丹。第四，市場經濟雖奠基於自由公平競爭，但實務證明它經常受到公平性與腐化質疑，例如 2008 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瀕臨崩解，卻要以廣大納稅人的金錢來紓困，對民眾實在難說公平（Sandel, 2012, pp. 11, 110–113）。最後更可能出現藉由培養政商關係來壟斷利益卻傷害人民權益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Macey, 2014）。第五，自由市場為求供需數量的精確計算，經常將道德予以中立化（Sandel, 2012, p. 14），以致容易忽略價格誘因的道德成本（Frey et al., 1996, p. 1300），從而使道德論述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出現道德虛無現象。

上述各種市場資本主義邏輯上的盲點，足以令人深生警惕：人類社會若由市場經濟的金錢報酬與懲罰制裁（外在動機）所宰制，則人類在個體心性成長與總體文明價值的提升上，將會遭遇相當障礙。

二、反思誘因排擠效應的弊害

除了市場資本主義邏輯有諸多盲點外，誘因排擠效應對當代社會亦有若干弊害，值得加以反思批判。

首先，誘因排擠效應將蠶食個人的自主決定價值（Atiq, 2014, p. 1080）。本質上，人是具有主體意識且有價值自我決定和選擇能力的個體，對自主決定有一定心理需求（Fehr & Falk, 2002, p. 714）。然而在一個由外在動機所驅動的社會裏，多數人的行動是由外部的賞罰所制約，內部自主決定的心理需求獲得滿足的程度低，自主決定價值空間逐漸被外部利害考量所侵蝕而日益萎縮。

其次，誘因排擠效應剝奪了行動者對他人展現內在動機的機會（Atiq, 2014, p. 1081）。對於內在動機不顯著的社會成員而言，經外在動機的排除後，幾無展現其內部自主價值決定的機會。而對那些內在動機顯著的社會成員而言，由於外在動機的擠壓，使他對其他人展現內在動機的空間（和意願）易受到剝奪。例如，前述瑞士核廢料處置案中，原支持者（50.8% 受訪民眾）在政府擬以金錢補償後，支持民眾幾近減半（剩 24.6% 受訪民眾支持），其間有 26.2% 受訪民眾的內在動機展現機會被外在動機所剝奪。

第三，誘因排擠效應容易對社會成員帶來內部性問題。在外在動機所驅動的生活模式中，行動者所要面對的決定日趨簡單而不費力，因而容易啟動直覺認知系統，並慣性地依賴外在動機迅速作成決定，因而容易忽略這些決定對自己未來的不良後果。換言之，誘因排擠效應將逐漸馴化社會成員習慣以短視近利的方式做決定，從而為他們帶來內部性問題。以上三項皆屬對個人層次的衝擊。

第四，誘因排擠效應對國家財政與法律體系容易帶來外部成本（negative externalities）問題。所謂外部成本是指一項行為對他人產生負面效應（Lee, 2010,

pp. 331–335)，如工廠排放廢棄物。社會中的外在動機愈強健，社會成員的公共責任或公共精神愈受到擠壓，而國家仰賴提供金錢報酬或懲罰制裁來達成公共政策目標的程度亦愈深。在此賞罰慣性運作下，提供金錢報酬必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而給予懲罰制裁則會增加制定與執行法律的需求，從而提高了外部成本。

第五，誘因排擠效應會扭曲社會價值體系。社會價值體系的建立奠基於多數社會成員的價值共識，在外在動機所驅動的社會生活中，多數社會成員的內在價值（如公民責任、道德考量、倫理信念等）逐漸被排除，從而使規範金錢報酬或懲罰制裁的具體規則成為評價行為的主要基準。然而，「報酬的隱藏性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reward）（Feldman, 2011, p. 25; Frey & Oberholzer-Gee, 1997, p. 746）日增的結果，就是市場價格（price）蠶食了社會價值（value），社會價值體系的完整性將遭到扭曲。上述第四和第五項是誘因排擠效應對社會或國家總體所帶來的衝擊。

由前述各項分析可知，誘因排擠效應無論對個人或對社會都將帶來相當衝擊。誘因排擠效應愈強，這些衝擊亦愈大。綜合而言，華人教師在教學生涯中對於前述市場經濟的種種盲點與誘因排擠效應的各種可能衝擊，應藉由言教的實際行動，積極予以揭露與批判，使學生在耳濡目染之餘能在認知上獲得宏觀理解。

身教轉化內在、外在動機失衡的困境

當全球化脈絡下人類內在、外在動機之間出現失衡之際，教育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華人社會幾乎都已籠罩在市場經濟下，受誘因排擠效應的衝擊亦與日俱增。於此情境，華人教師除藉由言教予以批判揭露之外，還可藉由身教的具體行動來扭轉自身社會裏內在、外在動機失衡的困境，進而使教師典範的自我形塑作用更為鮮明。本文認為，華人教師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身體力行。

一、體現彰顯內在動機的公共價值

首先，華人教師應將教育視作一種志業，並以具體實踐行動來彰顯內在動機的公共價值，成為學生參照學習的榜樣。內在動機的彰顯不但有實質的公共利益，更有長遠的公共價值。就實質公共利益而言，前已指出在外在動機排擠內在動機的社會，國家必將增加財政負擔；相對的，強化社會成員的內在動機，將有效降低總體財政支出，從而帶來公共利益。就長遠公共價值而言，強化內在動機將有助於美好社會願景的追求（Sandel, 2012, p. 13）。美好社會願景除要具備一定經濟條件外，多數公民更要富有公共責任與精神，前者可由活絡的市場經濟提供，後者則必須仰賴長期的教育來培養。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資源與內在動機在本質上有異，經濟資源有限，內在動機潛能無限。經濟資源會因反覆利用而日減，內在動機則因重複練習而日益

強健 (Sandel, 2012, p. 130)。因此，內在動機的強化將是蘊含豐富公共價值的資源開發工程。

那麼，華人教師富有身教意涵的具體行動為何？本文認為，值此華人社會尚稱重視師道且內在、外在動機失衡困境尚未積重難返之際，教師的具體作為應該包括：

(1) 對於法定薪資以外的金錢報酬應堅定予以婉拒；不當得利不但涉及違法，亦欠缺正當性，此舉明顯與出於個人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內在動機的表現相背離。(2) 對家長的金錢餽贈或實質報酬行為應堅定予以婉拒，並利用機會教育家長；教師出於內在動機的教育愛，不應被額外的實質報酬所排擠。(3) 對本職內的學生課業指導、生活輔導及行為輔導，教師應堅定婉拒任何額外的金錢餽贈或實質報酬。蓋傳道、授業、解惑是華人教師典範的基本內涵，背離此基本內涵將明顯違反教師的責任感要求。

本文提出上述主張，是認為華人教師的法定薪資雖各有不同，但待遇應已足以維持家計，故不應有上述足以妨害教師典範的行為。在長遠的歷史與文化演化中，華人教師的行為表現對學生一直有相當影響，若教師的實際行為超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倫理界線，學生將會複製經驗而更崇尚金錢報酬，從而對強化學生的內在動機產生不利影響。

二、誘導並鼓勵學生強化內在動機

其次，華人教師亦可在教育實踐中，以行動積極誘導並鼓勵學生強化內在動機。其具體作為包括：(1) 對學生的良好表現不要動輒以金錢餽贈或實質報酬作獎勵，應以公開表揚或其他具鼓舞作用的方式強化其內在動機；(2) 對學生表現不佳的行為，亦不宜動輒以金錢處罰或其他嚴厲制裁為手段。蓋實證研究顯示，以經濟誘因為制裁手段對行動者的利他精神有諸多負面效應 (Fehr & Rockenbach, 2003, p. 140)；以強調社會責任與公民德行來鼓勵公民誠實報稅，比用法律制裁的威脅手段來得有效 (Atiq, 2014, p. 1084)。是以，以「規過於私室，揚善於公堂」來輔導學生，對鼓勵學生內在動機將具有正面積極作用。事實上，內在動機人皆有之（如孟子所指陳之四端），只是在市場經濟洪流中，因受外在動機排擠而暫時潛隱於內，教師只要藉由適切的教育方法予以喚醒，即能顯現成效。

三、參與提升內在動機的教育方案

最後，華人教師還可積極參與有助於提升學生內在動機的校內、校外教育方案。大體上，世界各國教育對於因應全球化多有相關改革方案，包括師資、課程、教材、行政支持、校園文化、學習環境 (Iqbal & Arif, 2011, p. 100)、教學方法等。然而，若這些方案只著重於強化學生的外在動機，則對於轉化當前內在、外在動機失衡的困境

並無助益。由於有助於提升學生內在動機的教育方案甚多，所涉層面亦廣，本文以下僅舉「提升社會秩序的維護」為例來說明。

眾所周知，在全球民主化、自由化等總體趨勢下，各國的個人自由度已逐漸增加，而維護社會秩序已成為許多國家日益艱難的任務。最近有研究顯示，美國已有 320 萬學童曾遭受肢體霸凌 (bullying)，有 42% 孩童曾經歷網路霸凌 (online bullying) (Swan, 2015, p. 839)。為此，美國許多州政府已制定條例，規定父母親或家長必須管束孩童行為，如有違反，父母親或家長必須受到民事、刑事處罰。另外，許多州政府在條例中還規定，在簽訂租賃契約時必須有出租附帶條款 (lease addendum)，承租人若違反這些條款，容讓自己小孩或家人有霸凌他人、吸毒等違反社會秩序行為者，必須負起民事、刑事責任 (Swan, 2015, pp. 838-850)。這些與「法不入家門」原則相背離的規定，顯然仍以外在動機為出發點，其成效自有相當限制。就深思熟慮而有長遠成效的角度思考，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根本，必須有「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認知，並應以提升學生內在動機為重要考量。換言之，在教育改革方案中應該以增強個人的品味興趣、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為要務。實務上，教材內容可強化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大學的修身齊家之道等內涵；教育行政上應投注更多資源以支持教師進行相關教學活動，進而營造和諧而有同理心的校園文化；教師尤應以身作則，使學生在自然環境中經由耳濡目染而成為內化的價值信念，進而表現出尊重他人的具體行為。

總之，華人教師所屬教育體制雖有不同，但在不同教育活動中仍可積極建議提升學生內在動機的各種改革方案，甚至主動提出可行方案供教育行政當局作政策參考。

結語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由於歷史文化的累積涵養，華人社會對傳統教師典範已形成若干基本內涵。迄至現代化時代，傳統典範因應環境需求而有所遞移。20 世紀末，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華人教師典範又面臨挑戰。筆者相信，華人教師對全球化採取創造性回應的自我形塑模式，較具有主動和操之在己的積極意涵。本文即在探討，在全球化脈絡下，華人教師如欲進行典範自我形塑，在認知與行為兩個層次上的適切因應作為，俾能透過教育而使華人社會在享受全球化利益之餘，能減少全球化的可能弊害。

經過探察，本文認為，華人教師在進行典範自我形塑之際，認知上的主要課題在於如何面對教育全球化，或者如何看待全球化對教育的影響。就此，本文提出宏觀中道的教育全球化認識理路，其基本路徑如下：(1) 以綜合理解全球化基本徵象和主要面向為基本背景知識；(2) 以人類深思認知系統為認識理路的指引；(3) 一方

面掌握教育全球化各種詮釋觀點，並形塑出宏觀的「大同小異教育全球化詮釋觀點」；（4）另一方面則將既有理解參酌在地社會文化情狀，歸結出一個中庸之道的理念參照架構，以調和全球化與在地化。華人教師根據這一路徑可以建構典範自我形塑的認知圖像。

其次，在行為層次上，本文認為，華人教師在進行典範自我形塑之際，行為上的主要課題在於如何回應全球化的主要衝擊，或者如何回應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誘因排擠效應的衝擊。就此，本文提出批判和轉化兩種方法，以作華人教師回應誘因排擠效應的具體行動，包括：（1）以言教揭露和批判市場經濟的種種盲點，並反思批判誘因排擠效應的可能弊害；（2）以身教轉化現存世界內在、外在動機失衡的困境。於此，鑑於內在動機（個人的品味興趣、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已是當代人類重要資產，華人教師必須以身作則來彰顯內在動機的公共價值，進而誘導鼓勵學生強化其內在動機。而積極參與提升內在動機的各種教育改革方案，亦是教師應有的具體表現。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華人社會早已在市場經濟的有效射程內，而蘊含於市場經濟的誘因排擠效應隨着效益考量和利益競逐正在逐漸發酵，社會成員的個人品味興趣、自我實現、責任感、道德信念、倫理考量等內在動機，不斷遭到排擠與掏空，生活中除卻賞罰別無他物的衝擊將使美好社會的願景日益遙遠模糊。換言之，全球化雖因時空壓縮而使人類生命的長度與廣度增加了，但其誘因排擠效應卻使生命的深度開展受到相當局限。在此情況下，華人教師應將教育當成志業，除了洞悉全球化的利弊之外，還要藉由認知與行為的典範自我形塑，在教育具體實踐過程中，營造避開全球化負面衝擊的美好社會願景。

鳴謝

本文為作者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認真看待儒家哲學的當代價值：全球民主化與市場經濟脈絡下的探究」（計畫編號：104-2410-H-003-126-MY2）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贊助。

參考文獻

- 陳文政（2013）。〈全球憲政主義之興起——典範競逐觀點的初步考察〉。《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8期，頁1-81。
- 劉述先（2010）。《儒家哲學的典範重構與詮釋》。台北，台灣：萬卷樓。

- Ahdieh, R. B. (2013). Reanalyzing cost-benefit analysis: Toward a framework of function(s) and form(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8(6), 1983–2073.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ulaw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pdf/NYULawReview-88-6-Ahdieh.pdf>
- Angle, S. C. (2012).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Atiq, E. H. (2014). Why motives matter: Reframing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legal incentives. *The Yale Law Journal*, 123(4), 1070–11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yalelawjournal.org/pdf/Atiq_2os1z93o.pdf
- Bacchus, J. (2014). Clough Center Lecture: A common gauge: Harmo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7(1), 1–18. Retrieved from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704&context=iclr>
- Bayefsky, R. (2014). Dignity as a value in agency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Yale Law Journal*, 123(6), 1732–1782. Retrieved from http://www.yalelawjournal.org/pdf/1732.Bayefsky.1782_u52ftmb.pdf
- Bubb, R., & Pildes, R. H. (2014). 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 *Harvard Law Review*, 127(6), 1593–1678. Retrieved from http://cdn.harvard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vol127_bubb_pildes.pdf
- Chen, W. C. (2013, May–June). *Taking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seriously: A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Boston, MA, U.S.
- Davis, T. (2011). Taking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word and its spirit: Re-envisioning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 a binding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8(4), 883–909.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law.fsu.edu/journals/lawreview/downloads/384/Davis.pdf>
- de Búrca, G., Keohane, R. O., & Sabel, C. (2013). New modes of pluralist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45(3), 723–786. Retrieved from <http://nyujilp.org/wp-content/uploads/2013/11/45.3-de-Burca.pdf>
- Diamond, L. (2015).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141–155.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sites/default/files/Diamond-26-1.pdf>
- Fehr, E., & Falk, A. (2002).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centiv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4–5), 687–724. Retrieved from http://ac.els-cdn.com/S0014292101002082/1-s2.0-S0014292101002082-main.pdf?_tid=3cf88d12-d295-11e4-8de5-00000aab0f01&acdnat=1427250094_d7260dde28d7999c447e91bfa71870ba
- Fehr, E., & Rockenbach, B. (2003). Detrimental effects of sanctions on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2(6928), 137–140. doi: 10.1038/nature01474
- Feldman, Y. (2011). The complexity of disentangling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compliance motivation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of law.

-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35, 11–51. Retrieved from http://openscholarship.wust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63&context=law_journal_law_policy
- Frey, B. S., & Oberholzer-Gee, F. (1997). The cost of price incentiv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tivation crowding-ou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4), 746–755.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951373>
- Frey, B. S., Oberholzer-Gee, F., & Eichenberger, R. (1996). 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A tale of morals and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6), 1297–13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138940>
- Garcia, F. J. (2013).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power, states, and the role of law.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4(3), 903–919. Retrieved from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3310&context=bclr>
- Giddens, A. (2003). The globalizing of modernity. In D. Held & A.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2nd ed., pp. 60–66).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Ginsburg, T. (2010). Eastphalia as the perfection of Westphalia.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7(1), 27–45.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11&context=ijgls>
- Gneezy, U., & Rustichini, A. (2000a).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doi: 10.1086/468061
- Gneezy, U., & Rustichini, A. (2000b). 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791–810. doi: 10.1162/003355300554917
- Havercroft, J. (2012). Was Westphalia “all that”? Hobbes, Bellarmine, and the norm of non-intervention.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1(1), 120–140. doi: 10.1017/S2045381711000104
- Held, D., & McGrew, A. (2003).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 Held & A.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2nd ed., pp. 1–50).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 Perraton, J. (2003).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D. Held & A.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2nd ed., pp. 67–74).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Iqbal, M., & Arif, M. I. (2011). Globalization and paradigm changes in teacher education: Revolutionizing teaching learning process at school level in Pakist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4(4), 99–110. doi: 10.5539/ies.v4n4p99
- Jackson, K. T. (2013). Rethinking economic governance: A naturalistic cosmopolitan jurisprudence.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6(1), 39–120. Retrieved from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91&context=iclr>
- Kotzur, M. (2012). Overcoming dichotomies: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constitutional paradig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Goetting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 585–597. doi: 10.3249/1868-1581-4-2-kotzur

- Ku, J., & Yoo, J. (2012). *Taming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w,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 J., & Yoo, J. (2013).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1), 210–234.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37&context=bjil>
- Kuhn, T.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mar, A. (2009).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education: A stud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6), 33–35.
- Law, D. S. (2008).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2(3), 1277–1349.
- Lee, F. J. (2010). Global institutional choice.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5(1), 328–357.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ulaw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pdf/NYULawReview-85-1-Lee.pdf>
- Light, D., Jr., & Keller, S. (1985). *Sociology* (4th ed.).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 Macey, J. R. (2014). Crony capitalism: Right here, right no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37(1), 5–9. Retrieved from http://www.harvard-jlpp.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37_1_5_Macey.pdf
- Rose, S. J. (2014).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Using political inertia to protect civilian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7(1), 209–240. Retrieved from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710&context=iclr>
- Sandel, M. J. (2012).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pring, J. (2008).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8(2), 330–363. doi: 10.3102/0034654308317846
- Sunstein, C. R. (2013). The Storrs Lectures: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aternalism. *The Yale Law Journal*, 122(7), 1826–1899. Retrieved from http://www.yalelawjournal.org/pdf/1164_dtywzdgs.pdf
- Sunstein, C. R. (2014). The real world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Thirty-six questions (and almost as many answers). *Columbia Law Review*, 114(1), 167–211. Retrieved from <http://columbia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4/01/Sunstein-Final.pdf>
- Swan, S. (2015). Home rules. *Duke Law Journal*, 64(5), 823–900.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3795&context=dlj>
- Tushnet, M. (2015).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Cornell Law Review*, 100(2), 391–461. Retrieved from <http://cornelllawreview.org/files/2015/01/100CLR391.pdf>
- Yoo, C. S. (2014).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Harvard Law Review*, 127(3), 914–949. Retrieved from http://cdn.harvard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pdfs/vol127_yoo.pdf

**Self-reshaping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Contexts of
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Wen-Cheng CHEN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phenomenon that people have created yet cannot fully control. Facing its unpredictability, adopting a creative response to it will have autonomous and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teache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proper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ccommodations when Chinese teachers reshape the role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irst, it depicts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main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Second, “the macroscopic and moderate cognitive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 is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of framework for Chinese teachers on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Then, it proposes two best practices for Chinese teachers as guidelines to properly respond to the crowding-out effect implied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aradigm reshaping process on the cognitive and the behavioral dimension will help Chinese teachers, by devoting themselves to educational practice, create a promising society that can evade the disadvantage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paradigm of teachers; crowding-out effect; intrinsic motivation; extrinsic motivation

